

七卷本《陈思和文集》出版

## “我的整个学术研究过程,就是我的学习过程”

■本报记者 朱自奋

日前,由中山大学珠海校区中文系和广东人民出版社联合举办的“笔走龙蛇四十年——《陈思和文集》出版发布及研讨会”于珠海举行。

复旦大学中文系陈思和教授是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著名学者,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当代文学批评领域的专家。他受巴金先生和贾植芳先生的深刻影响,在研究和批评领域都自觉地继承了新文学的传统,体现着深厚的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他的研究和批评,融深厚学养和现实关怀于一炉,从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在研究界和批评界就逐步有着持续和强有力的影响。他相继提出的一些具有原创性的学术概念和理论,如“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整体观”“重写文学史”“民间理论”“潜在写作”“岗位意识”“先锋与常态”“共名与无名”以及“世界性因素”等,在学术界有广泛的声誉,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有着重要的影响。此外,他也是一位有社会关怀和践行精神的学者型知识分子,曾组织、倡导和参与“重写文学史”“人文精神大讨论”等在人文领域影响深远的学术讨论,并曾组织出版“火凤凰新批评文丛”“火凤凰文库”“火凤凰青少年文库”等丛书,在上世纪90年代初文化出版界青黄不接期间,开人文出版的风气之先。陈思和同时也是一位成就卓著的文学教育家,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陆续引导和培养了郜元宝、张新颖、严锋、宋炳辉、王光东、宋明炜(美)、鲁贞银(韩)、刘志荣、周立民、金理等一大批学者和批评家,通过做学问来做人,通过教育大批学生使得学术传统流传下去,堪称学者典范。



《陈思和文集》(七卷) 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出版

《陈思和文集》共七卷,收录了陈思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代表作,是迄今为止收录最全的陈思和个人文集。其中前三卷《告别橙色梦》《营造精神之塔》《在场笔记》,分别收录了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及新世纪的文学评论代表作,既涉及对各个年代文学状况的总体评价和观照,也涉及对如王安忆、贾平凹、莫言、张炜、余华、王蒙、严歌苓、卢新华、张翎、宁肯等作家的研究和评论,同时也包含他对当代文化问题和出路思考。第四卷《名著新解》收录了他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作品和代表性现象的细读。第五卷《巴金的魅力》收录了他关于巴金的研究论著。第六卷《新文学整体观》则收录了他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思考和研究,涵盖了他的学术名著《中国新文学整体观》正续编以及他对学科发展的思考。第七卷《星空遥远》则收录了他的回忆录和怀人纪事的散文,其中既包括他的少年生活回忆录《1966—1970:暗淡岁月》,也包括

一些怀人纪事的散文,写了在他的人生道路上给他深刻影响的人物,如巴金、贾植芳、冰心、郑超麟、匡互生、章培恒、曾华鹏、钱谷融、潘旭澜、李子云、周介人等等,集结起来几乎是一册20世纪知识分子精神变迁史,既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悲欢离合和波谲云诡,也体现了中国现代人文精神的传承。中山大学教授谢友顺认为《文集》直观地体现出陈思和作为一位学者的“巨大体量”,令人钦佩。

《文集》编辑、湖北科技学院陈国和教授说,在编辑该文集的过程中,令他感受最深的不仅仅是陈思和对文学史材料的熟悉,也不仅是他的理论创新,而是他面对当下知识分子遭遇的各种现实困境表现出来的勇气与责任,这是他对人文精神的守护和开拓。这部七卷本文集要把陈思和先生的学术精神与实践行为都囊括进来,是相当困难的。此外,由于篇幅的原因,陈思和还有许多理论成果未收入文集,如有关比较文学和外国文学、世界

华文文学成果,以及数量庞大的读书笔记和序跋杂文等。

广东人民出版社社长肖风华指出,陈思和的评论和研究,不仅是中国现代人文传统中鲁迅精神和巴金精神的活生生的继承者,同时也是从实际作品和文学现象出发,提出原创性理论和概念的“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代表,彰显出了用中国自己的理论话语和框架解释和描述中国自己的文学这样一种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对学术界具有深远意义。

《南方文坛》主编张燕玲认为,陈思和以其一以贯之的诚实正直的治学为人品格,赢得学术界和评论界的尊敬,这套《文集》有着“打通现代与当代”“重写文学史”的意义,其丰富和重要性是难以道尽的。

从事文学研究和教书育人一晃40年,陈思和回顾求学与治学人生,感叹时光飞逝,“我这一代学者,与现在的博士、博士后相比,并没有经过专门的长时间的文化知识上的学习,更多的是在生活中、工作中学习。我比较幸运的是我高考前是在街道图书馆工作,所以较早接触了当代文学。1977年高考进复旦后,我有幸认识了恩师贾植芳先生,贾先生本身就是一座大学。我研究巴金就是在学习巴金。如果没有巴金、贾植芳的教导和榜样,就没有今天走这条路的我。大家现在常常提到我在上世纪90年代主编出版的‘火凤凰’丛书,其实当年我编这套书的初衷就是看到年轻学者出书很困难,我就以巴金创办文化生活出版社为青年作家出书的精神为动力,办了这个丛书。我是在学巴金。后来巴金还为这套丛书题词。这套文集基本上是我的

文学评论集,没有把我的一些书评文字放进去。但其实读书随笔是我比较重要的文字,是我对自己的一种思维训练。往往在我提出一个理论概念之前,我已形成许多读书随笔,觉得某个概念在面对文学创作和现实问题时很好用,可以推广,然后才提出来。因此,我做人也好,做学问也好,实际上,我的整个学术研究过程,就是我的学习过程。”

陈思和一直认为,实践比理论更重要,行动比写作更重要。“这套文集是我四十多年来学习和生活的一个记录,也是我努力寻找一种生命活法的尝试。”有很多人惊叹陈思和有如此旺盛的创造力,写出如此丰厚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而陈思和却只是平和地笑笑,说,文字是他自我解压的一个方式,“其实我并不是一个表面上看起来那么乐观的人,所以会有很多迷惘委屈压力都沉积在心里,我平时也没有什么其他爱好可以去玩去转移,只有靠写作才能把内心的很多压力曲折折地化解掉。”

陈思和说:“在我的所有身份中,只有一个身份是令我全然快乐的,就是教师。看到学生的成长成熟成就,是我最欣慰快乐的时候。”在飞往珠海参加《文集》首发式的飞机上,他写了一首律诗,并以这两句结尾:“追光卅载桃林盛,唤作后生舞龙蛇”,用夸父逐日,身后留下桃林惠及后人的意象,来表达自己愿为学术传承和教书育人事业而奉献终生的心愿。

据悉,《陈思和文集》是广东人民出版社的“学人文库”系列之一,该社计划在未来五到八年内将中国人文社科领域共40位顶尖学者的著作集结出版。

(上接第一版)刘慈欣、郝景芳等科幻作家接连在国际上斩获科幻小说大奖,也让读者对科幻小说的兴盛充满期待。事实上,在中山大学的这次新世纪文学研讨会上,刘慈欣是被与会学者提到次数最多的小说家。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锋认为,刘慈欣“单枪匹马把中国科幻小说提升到了世界级水平”,而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其实刘慈欣的科幻小说还是跟主流文学有一种关联与回应,是对启蒙、英雄等中国文学重大主题的一种颠覆和改写。以刘慈欣的中篇《乡村教师》为例,小说类似于刘醒龙《凤凰琴》的太空版,一位乡村教师的最后一点的努力,最终却拯救了全人类。严锋认为,像这样的启蒙主题出现在科幻小说中,可以说意义重大,刘慈欣使中国文学重回了启蒙现场。

严锋指出,在这样一场有关文学的讨论会上提到很多科学、人工智能等话题,这本身值得回味。进入新世纪以来,科学还是那个科学,理性、强势、缺少人性,但科学又正在加速攻城掠地,在一些

以前不可能攻陷的地方步步为营,比如文学,以致于评论界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科幻文学到底姓文学还是姓科学?他当然同意刘慈欣的意见,科幻小说毫无疑问姓文学。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刘志荣以科幻小说中经常出现的人工智能为例,探讨文学与哲学、科学之间对话的可能。现在有很多科学家、小说家在超前思考一些由人工智能研发而带来的问题,即未来的人会不会变成神一样的存在,或人的历史将被人工智能终结?实际上,关于人工智能的未来畅想和思考,最后都会落到一个最核心的问题上,即人工智能是对人的智能的模仿,但人自己到底是什么?如何认识人自己?也是在这点上,最古典的西方哲学之问与当代最先进的科技之间可以展开对话。

刘志荣还特别强调了知识背景的变化给新世纪文学所带来的影响。他认为,新一代小说家的知识背景和之前的作家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对先锋文学、对各种类型文学非常熟悉,对古典文学也很内行。知识背景会影响作家的想象力,这已导致了新世纪文学在题材、气质上的一些

变化。毫无疑问,对今后的作家而言,个人生活经验的更新固然仍是基本功,而知识更新所带来的挑战同样不容忽视。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林岗认为,科技的进步正使得社会加速发展,也使得人类的未来变得越发捉摸不定。这种科技社会所引起的连锁反应波及到文学,可以看到,小说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性格令人捉摸不定的人物,故事情节则动辄就时空穿越、城市折叠,小说中的未来通常是不确定的、令人惶恐不安的,那个可以为之奋斗的可预期的未来似乎已经消失。“实际上,捉摸不定的未来正成为当代文学最鲜明的特点。”

## 新世纪文学的姿态:紧扣当下,放眼世界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从鲁迅对白话文新文学创作的评价谈起,以此观照新世纪文学。鲁迅一向从两个维度来看五四新文学创作,一是看这些最新的文学现象与世界文学的关系如何,即人已有之的前提下,我何为?二是看新文学与传统

文学的关系,也就是在古已有之的前提下,而今安在?“今天”和“我们”,正是鲁迅关注新文学的最主要角度。以此来看21世纪的中国文学创作,不难发现这两方面我们都有所忽略。“如果我们的创作和评论能够一方面紧扣当下,强烈关注当下现实,同时眼光一刻也不脱离世界文学的参照,我们的文学界可能就少一点困惑和苦恼。”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以梁鸿《中国在梁庄》和林白的《妇女闲聊录》这两部非虚构作品作对比,分析新世纪文学创作在反映中国当下农村社会问题时的探索与努力。都出自女作家之手,都给读者带来震惊的阅读体验,但林白笔下的农村样貌与梁鸿笔下的梁庄有很大差别,这其中,作家的问题意识、采取的叙述视角都值得留意。梁鸿的作品更契合中国当下对农村的想象,而林白则冒犯了大众审美,某种程度上更有先锋性。张莉指出,近百年中国文学对乡村的想象大致遵循鲁迅、沈从文、赵树理为代表的三个传统,而新世纪的乡土书写,更需要对书写者的思考进行反思。